

# 「人民的大學」：1949年新政權下中國 大學身分之建構——以北京大學為個案

羅雲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育研究所

在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國家政權更迭，大學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變化影響至今。把握了這段時期大學的變化，就能理解今日大學的形態及當下大學種種變革的基礎。本研究用歷史敘事的方法，以北京大學為個案，探討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之後，中國大學身分的變化與建構。研究發現，由於新政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市場缺失，所以建國之初中國大學的身分特徵純粹在國家與大學的互動中建構。1949年之後，經過國家對大學的接管改造、院系調整等措施，大學被納入到既有的政治、思想框架中，成為人民陣營之一部分，並進入了國家領域的範疇，成為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重要工具。由此，其身分也從原來的舊式大學轉為走向極具政治意涵的「人民的大學」。

關鍵詞：中國大學；身分；北京大學；敘事

## 身分、大學身分與敘事研究

### 身分與大學身分

「身分」(identity)是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概念。所謂身分，簡單而言即是對「我(們)是誰/他(們)是誰」問題的回答(Calhoun, 1994)。在心理學、社會學的研究中，身分概念常用於個人或群體；而在組織管理的有關研究上，一個現代組織或機構同樣存有身分。

對身分的研究，不同學科、不同研究層面的側重點各異。心理學和社會學對微觀個體身分的研究，通常是把它視作與人的社會化、人格發展等緊密關聯的內容，納入到人的發展、人的社會互動過程來討論，多關注日常生活的作用(Holstein & Gubrium, 2000)；而社會理論領域對集體身分建構的研究，則更強調社會文化、歷史、價值等對身分的形塑。然而，在更宏觀的組織研究中，Czarniawska(1997)將身分與現代

社會制度關聯，提出「現代身分」（modern identity）這概念。在現代身分這一層面，個體的人和組織的身分都已經去心理學化（de-psychologized），並從社會學的決定論（sociological determinism）中解放出來，跟更宏觀的兩大現代建制——國家和市場——緊密關聯，即身分是組織與國家、市場互動建構的結果，因而需要切實走入現場去理解。

在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國家政權更迭，大學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變化影響至今。能把握這段時期大學的變化，當有助理解今日大學的形態及當下大學種種變革的基礎。但新政權下的中國大學到底是甚麼樣子？大學與所處的國家以及社會／市場又有怎樣的關係？<sup>1</sup>對大學與國家、市場關係的過往研究大致沿兩條思路展開：一是從「大學是甚麼」的討論，推演出大學與國家、市場的關係；二是從大學制度改造或創新的主題下展開，其中仍然是演繹的邏輯：從應該建立甚麼樣的大學制度，推理出需要如何調整大學與國家、市場的關係。純粹對「大學是甚麼」的現有研究，焦點多在對「大學理念」作歷史梳理。這些研究，重心都在「應然」層面作情境化的論述，研究策略多為歷史比較或純粹思辯，其目的或在政策詮釋，或在現實批判。<sup>2</sup>這些研究給讀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以及邏輯嚴謹的應然論證，但把大學從具體的場景中撥離開來，而大學與國家、市場的關係則被架空，以至從中看不到那鮮活具體的大學的人物與事件，亦看不到現實脈絡中大學的真實面相，而這正正是研究者所應關心之處。因此，本研究引入「身分」這概念，力求轉換視角，走入現場，從微觀具體的人物、事件出發，考察大學與國家、（市場）在高等教育場域中如何互動並建構起怎樣的「大學身分」。至此，大學身分的問題不再是個「應然」的命題，相反是大學與國家、（市場）互動建構的結果，要在現場中理解。

## 敘事研究及其在本文的運用

對身分建構的研究，敘事（narrative）是近年廣為社會科學研究學者推介的研究方法之一。Somers & Gibson（1994）指出，無論是社會意識、社會行爲，還是社會上的人、組織或機構，都具有可敘事性，由敘事形成故事，建立意義是理解社會生活的有效途徑（p. 38）。Richard Jenkins 認為，身分本是有關意義的問題（轉引自 Haralambos & Holborn, 2000, p. 921），身分建構其實亦是意義的建構。由此，Somers 在其研究中直接使用了「敘事身分」（narrative identity）的概念（Somers, 1997, p. 86; Somers & Gibson, 1994, p. 64）。法國學者 Ricoeur（1991b）在較早時亦提出過這一概念，它意指身分類型是通過敘事的整理而獲得。敘事是對敘事主體過往生活的歷時性故事化講述（story-telling），通過敘事以重新審視、理解過往。Ricoeur（1991a）借用蘇格拉底名言「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轉引自 Ricoeur, 1991a, p. 20)，並把它改寫為「如果生活未經闡釋，那它只不過是一種生物現象」(Ricoeur, 1991a, pp. 27-28)，而敘事是一種闡釋的方式 (a way of interpreting)，它正好說明了敘事與生活之間的關係。生活如此繁複瑣碎，無論個體還是組織，其生命歷程都不是條理清晰、單一線性的延伸，如此而言，怎麼敘事？敘事甚麼？如何經由敘事達成「敘事身分」？對此，Somers 從「敘事」的特點入手作了詳盡的分析。

Somers 指出，敘事有四個特點：(1) 各部分的關聯性 (relationality of parts)；(2) 因果情節化 (causal emplotment)；(3) 選擇性拿取 (selective appropriation)；(4) 時間、順序與地點 (temporality, sequence, and place) (Somers, 1997, p. 82; Somers & Gibson, 1994, p. 59)。首先，敘事是由一系列彼此關聯的部分組成的整體；各部分的關聯在於將獨立的事件轉變成整體中的一個情節，這就有賴於對事件進行因果情節化；生命歷程繁複，事件與經歷無數，任何敘事都不可能巨細無遺，因此，敘事的另一要素是在特定主題及相應時段裏對在此期間影響重大的關鍵事件 (critical events) 進行選擇性拿取；事件在一定的時空關係情境 (relational setting) 下發生並與其他事件關聯，對選擇性拿取出來的關鍵事件進行因果情節化實際上是將事件放回到特定的時空序列中，建立起事件之間的關係結構。通過這一結構，包含在敘事中的事件得以整合為敘事有機整體中的組成部分，並因此給賦予意義 (White, 1987, p. 9)。最後，在這樣的關係結構邏輯中，將產生有着內在一致性 (coherent)、有道德意涵 (moral) 的結論 (conclusion) 或結尾 (ending)<sup>3</sup> (White, 1987)，當中敘事主體給置於某一特定位置並建構起整全一致的意象，「是誰」的問題因此得以解答，即建立起所謂的「敘事身分」。據此，透過敘事，個體或社會組織得以把生活中種種繁複、瑣碎的不協調現象 (discordant phenomena)，組織及整合成敘事的整體 (narrative unity)，並成就生命中的連續性 (coherent in life) 及不協調的協調 (discordant concordance) (Ricoeur, 1991b, p. 195)。

本研究在「身分」、「敘事身分」的理論視域基礎上，對研究對象在 1949 年新政權之後所發生的關鍵事件 (包括頒布、發表的一些重要文件文本等) 作歷時性的因果敘事，繞開宏大的去情境化 (de-contextualization) 論述，在「實然」層面把握大學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大學身分的變化與重構。

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是：1949 年新政權下中國大學的身分建構。「中國大學」是個泛化或抽象的指稱，且難以操作，因此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進行。在個案研究中，常被討論的是個案的代表性。但在研究者看來，任何個案都不具代表性，在此研究者用「典型性」去解釋本研究的個案選取。所謂「典型」，即個案極大程度集中了研究問題所需要的信息，從對個案的研究中，讀者可以由此及彼，見微知著，讀到自己關心的部分並有所反思。

本研究的個案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長期與國家（特別是與國家政治生活）息息相關，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北京大學創辦之初至今，它一直對國家的發展舉足輕重。由於其特殊的位置，它既具有其他院校與國家、社會／市場關係中所面臨的困惑，同時亦有自身特有的張力。看北京大學，就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大學與國家、社會／市場之間的種種矛盾與張力，而研究可以呈現出 1949 年之後中國大學與國家、社會／市場之間的深刻互動及大學身分的建構。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北京大學具有典型而豐富的個案意涵。

1949 年，新中國成立。新政權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繁榮富強的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政治上民主，經濟上發達，文化上新銳；它要與舊社會徹底決裂，除舊賦新。「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不僅是當時振奮社會人心的口號，更是新政權給予社會整體改造實踐的政策導向（任劍濤，1998）。大學是社會肌理的一部分，它被視作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工具及意識形態的依附機構而加以全面改造，要為新中國建設服務。改造集中於 20 世紀 50 年代，左右搖擺持續至文革（即文化大革命）期間，但本研究敘事的時間段落集中在 1949 年到 50 年代前半期，至於 50 年代後期，如 1957 年的「反右」運動、1958 年大躍進直至文革期間的一些改革，在研究者看來是偏離常態的做法，變數太多，難以納入本文討論，所以暫且擱置起來。

新政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毛澤東，1949），其教育「是人民教育，是為人民服務的教育」（錢俊瑞，1950/1998），大學則應為「人民的大學」。所以，當研究者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翻閱發黃的舊校刊時，不止一次讀到諸如「使北大真正成為人民的大學」（羅常培，1951）、「把北大改造為真正的人民的大學」（楊振聲，1950）的字樣。

何謂「人民」？何謂「人民的大學」？在新政權的政策方針下，改造如何在一所具體的大學運作？實踐賦予「人民的大學」甚麼樣的具體意象？本研究正是要透過歷史文本中所呈現的敘事，以分析「人民的大學」這一身分如何在 1949 年新政權的時空脈絡下得以建構起來。

## 政策文本中的概念：「人民」與「人民的大學」

### 人 民

「人民不是一個總體，而是無數個體」，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丹東，在親自審批送人上斷頭台太多之後有所醒悟而發出的感歎（劉小楓，1998）。但就在研究者走進中國的歷史語境與場景時，看到的卻恰恰相反。「人民」，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並非實踐或服務的具體對象，而是個包含政治理想與政治道德的符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有着不同的意涵：在延安時期，用的是民族主義的定義；在內戰時期

和建國初期，是按經濟地位劃分（劉雲杉，2001）；而在隨後的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則在一定程度上被意識形態<sup>4</sup>化了，更多是政治立場的標籤，扮演着政治動員、敵我二分的作用。<sup>5</sup> 與之關聯，相關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被冠以「人民」來作限定詞，以區別於舊政權下的機構、行業，「人民的大學」是建國之後常見的對大學的稱謂。對此，如何解讀？

## 人民的大學

在新政權的語境下，之前的教育都被稱為「舊教育」。根據當時教育部部長馬敘倫（1949/1998b）的表述，<sup>6</sup>「舊教育」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產物，它反映並服務於舊政治、舊經濟，它提倡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它是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的統治者服務的。隨着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的統治在中國宣告終結，「舊教育」的政治經濟基礎被摧毀，代替它的是反映新政治經濟並以之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鬥爭工具的「新教育」，亦即「人民教育」。

從當時的政策語境看，與「人民」概念相關，「人民教育」同樣是承載了國家政治理想與政治道德的符號，其含義<sup>7</sup>有二：首先，是政治立場的表達，其中的「人民」是政治屬性的概念，「人民教育」即反映新政權意志的人民政權管制下的教育；其二，「人民教育」中的「人民」是對象化的指稱，意指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兩層含義緊密關聯。

「人民的大學」應「人民教育」的概念而出現，它的含義同樣有兩方面：其一是指在政治立場歸屬上，屬於人民政權領導管理的大學；其二則與此相關，從服務對象性質上指為人民服務的大學。

## 人民政權領導、管理的大學

1949 年建國時，全國共有高等學校 227 所，其中公立學校 138 所，佔總數的 61%；私立學校 65 所，教會學校 24 所，兩者約佔總數的 39%。在這些高等學校中，除了大約 15% 是創設在老解放區或是經過徹底改造之外，其他約 85% 的高等學校都是原國統區（國民黨統治區）的學校（馬敘倫，1950/1998a）。從新政權的立場看來，國統區的大學與所處政治環境相關，代表原有舊統治階級的利益並為之服務。政權更替之後，需要對這些「舊式大學」<sup>8</sup> 進行接管改造。

解決政治上的領導問題是根本，亦是「舊式大學」轉向「人民的大學」的第一步。羅常培（1951）認為，北京大學「是從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經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組接管以後才開始變成了人民的大學」。1950 年，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馬敘倫部長在高等學校的領導權上便傳遞了中央的意思：

要逐步實現統一和集中的領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對全國公立的高等學校，在方針、制度、設置計劃、負責人任免、課程教材及教學方法等方面，都應該負有領導的責任。……至於私人辦的和教會辦的私立高等學校，也都必須服從人民政府的法令，奉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政策……在目前階段，中央教育部因為客觀和主觀條件的不足，暫時委託各大行政區教育部或文教部領導各大行政區的高等學校，而隨着必要與可能，中央將逐步地實行對全國高等學校的直接的管理。（馬敘倫，1950/1998a）

## 為人民服務的大學

「人民的大學」的另一含義是為人民服務的大學，其認受性的獲得則在於接受中央政權的領導，奉行中央的方針政策積極改造。建國之後，對高等學校的重塑與改造集中在 20 世紀 50 年代前半期，其中政策主要涉及三方面。

第一，高等學校對工農開門。1950 年教育部錢俊瑞副部長在《人民教育》第一、二期上刊出〈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一文，分上下兩節，分別題為「論教育為工農服務的方針」和「論教育為生產建設服務的方針」。文章指出，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是實行新民主主義教育的中心方針。在文章的上節中，錢副部長從當時的教育現狀、社會階級構成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的特點出發，論述了教育為甚麼應該首先且主要為工農服務，以及教育怎樣為工農服務，包括教育內容和教育建設部署的問題。在有關教育部署中，錢副部長特別指出，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今後政府應當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群眾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而建國後，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還很少，這種情況對新中國的建設，特別是對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不利。因此，要通過舉辦工農速成中學、鼓勵各級各類學校為工農及其子女開門等政策，培養大批新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之門，必須為廣大工農青年和工農幹部敞開（轉引自錢俊瑞，1950/1998）。隨後，1950 年 6 月 1 日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召開，這一指示亦見於馬敘倫部長的會議開幕詞中。

第二，在高度政治化的國家，沒有具體的個人利益，只有國家的整體利益。為人民服務，對象不在於具體的個人，而主要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因此，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主要是為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所以建國之初，應恢復和發展人民經濟的需要，高等學校展開了建國的第一輪課程改革。根據當時國家建設的實際需要，1950 年政務院（即現今的國務院）通過〈教育部關於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廢除政治上的反動課程，設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課，藉以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理論聯繫實際，實行適當的專業化，克服原來「為學術而學術」的教條主義偏向，等等。之後，高等學校中政治課不斷被強化，而專業化改革在 1952 年的院系調整中達到極致。政治課改革旨在改造

學生思想；而專業化改革則在於造就可以直接投身國家建設的人才。「又紅又專」<sup>9</sup>的社會主義新人培養，起點大抵就在此。

第三，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據當時估計，建國時多數知識分子都不是「根紅苗正」的工農出身，多帶有不同程度的資產階級思想；而且，由於國統區原來的教育，學校中思想意識還存在各種複雜不純的情況（中共中央，1951/1998）。因此，爲了讓知識分子能更好地服務於新政權和新的社會建設，新政權確立之後需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和清理。<sup>10</sup>

1950 年底，電影《武訓傳》<sup>11</sup> 所引發的討論，突顯了新舊意識形態的衝突。文教界對武訓及其電影的歌頌如此之多，讓毛主席意識到思想界的混亂和意識形態改造之迫切。教育界（特別是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地的高等學校）自然成爲改造運動的重鎮。因此，隨後 1951 年 9 月 29 日周恩來在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講話（周恩來，1951/1998）。同年 11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組織改造與個人改造同時展開，指出「學校是培植幹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機關。黨和人民政府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1952 年 5 月 2 日，中共中央專門針對高等學校，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指示〉，從技術層面對批判改造和清理作出了具體安排，要求徹底打擊舊思想，劃清敵我界限，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

革命性的接管，確保高等學校／大學的領導權實實在在掌握在新政權手裏；而繁複的政策重塑與改造，旨在將大學從爲舊統治階級服務的機構改造成爲廣大人民服務的機構。只有這樣，大學方能被納入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權陣營，並換上新的政治標籤：「人民的大學」。

以上是將「人民的大學」置於歷史的政策語境中剖析其含義。接下來的內容，焦點將放於北京大學這一所學校，探詢「人民的大學」在實踐中的具體建構。

## 實踐建構的大學意象

紅旗、標語、熱烈的口號、歡騰的人群、毛主席畫像所集合的景象，是那個偶像崇拜年代最常見的儀式樣版。北京大學也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中重獲「新生」，「有了成爲人民的大學的無限發展的可能」（錢俊瑞，1949，轉引自呂林，1989，頁 85）。

以下將着力考察這個「無限發展的可能」怎樣轉化成爲現實，並探討所建構出來的究竟是怎樣的現實。

## 擁護接管

1948年北平(北京的舊稱)的冬天,悲歡齊登場:11月人民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城;國民黨退出統治。政局的變化,北京大學(下文簡稱北大)迅速作出反應:時為國民政府任命的校長胡適先生,在12月15日離開北大,南下走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正式宣告解放,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管會主任錢俊瑞、張宗麟等人代表中共,到了北大。

國民黨統治後期,城市一片狼藉,而且民心喪失已盡,這為共產黨的到來提供了很好的政治資本:城市居民更願意支持這個許諾可以帶來和平與秩序的政黨,其中,大學生、中學生是共產黨最熱情和最積極的支持者,而大多數知識分子也願意在新政權下工作(莫里斯·邁斯納,2005,頁73)。所以,就在北平解放、中共代表來到北大第二天,2月1日上午,北平各大專院校師生聚集在北大民主廣場,慶祝人民自己的解放。據蕭超然等(1988)整理的校史描述,當時的集會,「人們歡呼、雀躍,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頁455)。如果說中共的及時進入,只是政權正式介入大學的前奏,或者只是一種姿態的表達和在教育界的動員策略,那麼師生群眾的積極回應,則無疑給黨接下來的工作帶來了無比的信心。

在任何一個構成複雜的社會政治核心中,統治精英總有一套儀式、象徵形式去表達管理統治的操作行爲;不管這個社會的統治成員是如何產生,或他們彼此之間有甚麼分歧,他們都會集結一些共識性的典儀、徽章、手續以及那些或世襲得來,或以革命手段發明的形形色色的附屬物,來昭示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行爲的權威性(克利福德·吉爾茲,2004,頁162-163)。中國共產黨新政權的統治亦不例外: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軍舉行隆重的入城式。北平大街小巷掛滿了標語,彩旗迎風飄揚。宣傳車上奏起了解放軍進行曲,載滿士兵的卡車上懸掛着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畫像。歡呼和口號聲不絕於耳。

2月28日,北京大學正式由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管會接管。這天下午,沙灘民主廣場樓房的旗杆上飄揚着一面寫有“民主”的紅旗,接管大會在這裏一片熱烈的氣氛中進行。

文管會主任錢俊瑞在會上說,“現在……人民統治了北平,北大有成了為人民的大學的無限發展的可能。”他宣佈了新的教育方針……取消國民黨時期沿用的訓導制度,取消了諸如黨義一類的課程。

哲學系教授湯用彤代表校方表示擁護接管。然後在“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由校旗作前導,錢俊瑞、湯用彤和全校師生員工……開始繞場一週。接着,兩千多名北大師生員工高呼“慶祝北大新生”、“北大新生萬歲”的口號,走出民主廣場,沿東宮房、景山東街、松公府遊行。沿途,市民也加入了遊行隊伍。(呂林,1989,頁85-86)



這是當年解放軍入北平城和隨後中共接管北大的場景片段。<sup>12</sup>

革命性的佔領是武力的較量，而政權的和平統治則在於群眾動員和權威的合理化傳遞。解放軍進行曲、紅旗、毛主席或朱德的畫像，都是那個年代有關中國共產黨的象徵與想像，所有關於黨的抽象政治道德都蘊含其中。當進行曲響徹全城，到處紅旗飄揚，隨處可見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時，人們會生出無限的政治想像力：共產黨來了，毛主席來了，正是他趕跑了萬惡的舊政權，使人們翻身得到解放。於是，萬眾歡呼，迎接這個新政黨的到來。就是在這個軍民同慶的場景中，黨的權威在人民群眾中得以確立、認同並合法化。

在對北大的接管上，會場外高揚的紅旗，中共派來的代表的身分，構築起一個無形的權威。對於台下聽眾而言，他們聽到的其實不是站在講台上的那個人說話，而是身後無形的權威在發言。在一個合法合理的權威前面，於是人們看到：湯用彤教授代表校方表示擁護接管，師生員工歡慶北大的新生。

簡單而自然，新政權接管了北京大學。1949 年 3 月 1 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代表錢俊瑞、張宗麟奉命到北大督導一切行政教學工作，另派有七位聯絡員駐校，了解情況，以作聯繫（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1998，頁 403）。

## 大學校長只有工作任務，沒有辦校方針

胡適先生離開北大之後，校長位置一直空缺，校務則交由當時的行政會議委員湯用彤教授等人<sup>13</sup>打理。接管後，軍管代表、聯絡員駐校不久，1949 年 5 月 4 日，大學成立校務委員會，<sup>14</sup>湯用彤教授受命任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主席，繼續主持校務。

新政權正式成立後，各項制度相繼推出。1950 年 5 月 30 日，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高等學校領導關係問題的決定〉、〈高等學校暫行規程〉等有關草案，<sup>15</sup>其中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對全國高等學校的領導關係，並規定了大學及專門學院實行校（院）長負責制。指示發出，教育部開始考慮各大學校長的人選。北大校長最後落實為馬寅初先生。1951 年 6 月 1 日，新校長正式到校就職，屆時馬老正好 70 歲。

國家任命甚麼樣的人擔任大學校長，凸顯了國家對大學的立場與定位；而受任者及大學師生的回應則暗示了對外來定位的支持或否定，兩者互動是大學身分建構的關鍵之一。因此，這裏需要明瞭的是：中央政府為甚麼要選任馬老擔任北大校長？馬老對國家的任命有甚麼反應？至於北大師生，他們又是怎樣對待這一外來的校長與任命？

## 中央政府為甚麼要選任馬寅初先生擔任北大校長？

對歷史問題的回答，任何猜測都是有問題的，所以還是讓研究回到就職典禮的

現場，直接聽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任命的教育部馬敘倫部長是怎麼說的。馬敘倫部長從北大在國家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談到政府對物色校長的慎重，然後特別提到：

從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大學必須是校長制以來，我們就考慮各大學校長的人選，可是遲之又遲，我們才物色到北大的校長，就是北大的老校友，老教授，是我們的，也是有些先生們的一二十年前同事過的馬寅初先生。寅老年齡正七十了，但他的健康，醫生還許他可再活三十歲。他的學術地位，他的政治見解，真是與年俱進，為全國所仰望。他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大膽地揭露四大家族宋子文、孔祥熙等的貪污作風，被蔣介石匪首把他軟禁了幾年，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才得釋放，但他仍不屈不撓地參加人民民主革命鬥爭，單身應南京中央大學學生的邀請，在一兩千的聽眾和特務監視之下，痛斥反動政府，毫無顧忌，這樣的人格是可以為國人矜式。……北大今後在馬校長領導之下，一定可以更能邁步前進，克服各種困難，有輝煌的建樹……（馬敘倫，1951）

如果暫且拋開中國的具體情境脈絡，把大學視作具有學術自由與獨立的理想型機構，用一種置身場外的心態來討論大學校長應由甚麼人來承擔，研究者認為最基本的應該考慮兩方面：一是學術成就，這是大學這一特殊機構——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對「業務」能力的要求，他／她應該是一個學術領袖；二是管理能力，這是把校長視作管理者而對在其位者能力的要求。

馬寅初校長毫無疑問是個優秀學者，在經濟學領域有重要的學術貢獻。但是不是他的學術成就將他推上了校長的位置呢？研究者注意到，在馬部長的致辭中，馬老的學術成就沒有具體的得到展開，只是將其與「政治見解」放在一起，給了「與年俱進，為全國所仰望」這一句話，而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緊接其後對其革命業績的具體羅列。同樣，錢瑞俊副部長在提及馬寅初先生出任校長時亦表示：馬寅老是堅決革命、永遠年青、充滿力量、充滿希望，要走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這樣一位革命的戰士；他仇恨反動派，熱愛青年，熱愛人民，不斷學習；有這樣一位充滿青年氣概的馬老就任北大校長，這是文教事業上的一個好消息（〈馬寅初校長到校就職〉，1951）。篇幅的多少本為形式，但形式的內容卻道出了在物色校長中的所有看重——意識形態先導、政治立場導向的選拔標準。身為學者的馬寅初當然是使其就任校長的一個基本條件，但真正成就他成為校長的更在於他對反動派的堅決鬥爭，用前文的說法，即：他是人民的一員，站在人民陣營中。接管後的大學，它應該是人民的大學。人民的大學須交給人民領導，才能放心，保證方向正確。如此，則接下來需要繼續問的是：馬老怎麼回應中央的任命？他是否確保了大學方向正確？

## 馬寅初先生怎麼回應中央的任命？ 他是否確保了大學方向的正確？

據西方學者卜德所記錄一位自由主義的教授對建國前後知識分子的評論說，其實中國多數知識分子都不願意捲入政治（轉引自莫里斯·邁斯納，2005，頁 74）。但是在原來的國民政府裏，知識分子經常是一方面聽到政府反覆宣稱要給中國帶來民主和廉潔的政府，另一方面又發現這些諾言在實際生活中反覆受到嘲弄。最初，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支持國民政府，儘管它有許多錯誤，但期望它會改革，但事實上，政府的情況不但沒有改進，反而每況愈下，所以很多知識分子對它徹底失去了信心，轉而願意支持共產黨。加之共產黨一向注意對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改造，所以在建國後，很多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是滿懷希望地支持和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馬寅初先生大抵是其中之一。在受命擔任北大校長時，他已在中央部門身兼數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馬絨倫，1951）。

就職典禮的講話中，馬寅初先生謙虛的表示，以自己的學識和能力，實在不配作北大校長，將來自己所做的是否能比得上解放以來校委會及湯用彤老先生的成就，也很成問題。但是，能讓他放心的是，北大是教育部直接領導的，可以隨時請示（馬寅初，1951）。

按照慣例，在新校長就職講話裏，同學們都會期待聽到新上任者的建校治校方針，但在馬校長看來，在中央政府直接領導的體制下，「建校方針是中央所定，一個大學校長只有工作任務，沒有建校方針，一個校長應以執行中央的政策推動中央的方針為任務」（馬寅初，1951），所以他談不談方針，而「要講的是如何以團結一致的精神來發揚北大的光榮的——革命傳統，保持學術地位，並配合國家建設工作的開展，為國家造就大批建設人才」（馬寅初，1951）。為此，馬校長在講話中還特別肯定了現在教授中人人關心政治、為人民服務的新風尚，而不再是過去那種「為科學而科學」、「為學術而學術」的獨善其身態度了。簡短的幾句話，表達了大學校長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對大學校長的任命是中央政府對大學領導的具體執行，校長將以執行政府派發的工作任務為己任。馬老對於中央政府任命的理解無疑是正確的。這樣，有着「又紅又專」歷史的新校長管理學校，大學的方向正確便有了基本的保證。

如果沒有大學自身或者說大學內部的師生對中央的任命以及這位派來領導他們的校長的接納，對大學的領導那也不過是中央政府和校長對大學「一廂情願」的期待，走不進現實。上級的意願是否化成民意？所見是「一廂情願」的烏托邦，還是「互動建構」的實在？為此，就要進一步探問大學師生如何看待的問題。

## 大學師生怎樣對待中央政府的任命以及這位派來的校長？

還是回到《北大校刊》對典禮現場的紀錄：

六月一日的早晨，校門口掛起了鬥大的紅布標語：“熱烈歡迎馬寅初校長到校就職！”民主廣場上擠滿了人，大家都喜氣洋洋。“沙灘”、“新文藝”等壁報門出了“歡迎馬校長特刊”。

八點鐘，在會場熱烈掌聲下，教育部馬部長、錢、韋、曾三位副部長，還有高教司張宗麟、張勃川兩位副司長一起陪馬校長到場……

馬校長就職典禮大會在莊嚴的國歌聲中開始。首先由湯用彤先生代表全校師生員工對馬校長致以熱烈的歡迎，湯先生一開口就說：“今天是我们北京大學的一件大喜事”……

……馬校長的講話是這樣的直爽、有力，充滿了熱情和信心，不時引起全場的歡呼鼓掌。最後當他領導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北京大學萬歲！”之後，台下高呼“馬校長萬歲！”“歡迎年青的馬校長”……各系同學都紛紛上台獻花、獻辭、獻上了他們對於校長的尊敬和愛戴，都表示願意在馬校長領導之下……做一個全面發展，為祖國建設所需要的人才……（〈馬寅初校長到校就職〉，1951）

在中央集權的教育管理體制中，校長任命是國家權力進入校園的重要途徑之一；而校長就職儀式則是權力介入合法化的重要環節之一。在這樣的場景敘事中，最顯見的仍然是熟悉的群眾運動式的熱烈，而人物之間的差序格局亦異常清晰。儀式就像精心打造出來的前台戲，角色扮演有條不紊，國家—大學之間的抽象關係也在此得以具體鋪陳開來。

莊嚴的國歌寓意了國家力量的無形存在。馬校長由教育部高級官員陪同進入會場時，意味着「國家」這個制度化的力量在這個時候亦開始進入校園。

學校門口掛起的歡迎標語、湯用彤教授代表師生員工的講話都是大學官方聲音，背後所代表的只是抽象、假定的大學師生員工，它展示的其實是學校層面對新校長的接納，而更深刻的則是北大身爲一所公立大學，它對國家政權領導的認同。台下師生用熱烈的掌聲、口號以及獻花獻辭的方式表達了對中央政府領導任命的擁護和對新校長的歡迎。這符合那個時代情感與立場的表達方式，直接而熱烈。

## 經過思想改造來推進學校改造

北大師生在思想上已經比別的大學進步得多，倘思想上還有不進步的，希望其快快改造以迎接大時代。（馬寅初，1951）

這是新校長在就職演說中對北大師生提出的一個希望。爲甚麼要「快快改造」？又怎麼改造？

### 關於思想改造

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意思是知識分子必須依附在某一階級上。過去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及小生產所有制的社會，知識分子吃他們的飯，附在他們身上；但現在，新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特別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公有制階段，<sup>16</sup> 因此，知識分子理應附於公有制身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毛主席的一番話是在 1957 年期間說的，也可以說是對早前黨對知識分子態度與政策的一個形象概括。知識分子，位置固定了，任務便是改造。所以，在解放後的一段時間裏，「改造」是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言說中最頻密出現的詞彙之一。北大是知識分子的集中地，誰都不可回避，馬老對師生的期待也緣此而來。與此相關，在新政權接管和領導關係確立後，思想改造亦隨之在北大展開。

針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與改造，在制度層面主要是調整課程設置。文管會在接管北大的現場，便當即宣布廢除國民黨時期特色的制度與課程，要求學校盡量添設新的、革命的課程；隨後，在 1949 年 9 月 22 日的校務委員會上，決定設立革命的馬列主義政治課，規定全校學生必須修讀，並特別強調該課程不能緩修或免修；業務課方面則是在教學內容上去除舊的反動課程，增開一些新的課程，並加強了課程的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在教學方法上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曾昭掄，1950）。1952 年 10 月，教育部頒發〈關於全國高等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課程的指示〉，規定綜合性大學自 1952 年度起，一、二、三年級分別開設「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自 1953 年起開設「馬列主義基礎」，北大遵照指示對課程作了安排（王學珍等，1998，頁 461）。

教職員工的改造，是整個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改造方式通過學校自上而下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政治學習來展開。

1951 年的暑假，爲了提高職員的政治認識，樹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工作作風，校長首先倡議並主持了全校職員暑期的政治學習。在學習動員會上，馬校長反覆表示，現在社會在往前跑，大家也得往前跑；不前進，就要落後；如果誰堅持落後，就會變成反動；大家要來學習，學習不僅是爲學校、爲國家好，更是爲自己好（否則就會被社會淘汰）（馬寅初，1951/1999c）。學習方式包括學習文件、<sup>17</sup> 聽報告及討論等形式。職員暑期學習持續了四十多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也提高不少（馬寅初，1951/1999a）。

職員暑期學習之後，北大又開始在全校教職員中開展了一次有計劃、有系統的政治學習運動。這一次的政治學習運動主要是針對北大自由散漫的作風，<sup>18</sup> 但更深刻的目的是通過思想改造來實現學校的改造。自由散漫的作風被認為有重要的思想根源，不利於北大從一所舊型大學改造成為新的人民的大學，必須加以糾正。通過思想改造，希望廣大教職員工能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真正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進而推進學校的改造。學習的方法仍然是學習文件、聽報告，並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報告主要由中央政府首長主講，具體由教育部佈置安排並領導學習（馬寅初，1951/1999a）。1951年9月29日，周總理做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首場報告<sup>19</sup>（周恩來，1951/1998），政治學習正式開始。

這次的政治學習計劃，由於國家的「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開始，學校在1952年1月12日遵照中央指示，停止政治學習活動，開始轉入「三反」鬥爭中（王學珍等，1998，頁443）；同年5月，「三反」運動告一段落，再轉入忠誠老實運動。忠誠老實運動亦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旨在於人民內部劃清敵我界線。運動分為準備階段和開展階段。準備階段主要是幹部學習，通過「啓發自覺，不追不逼」的原則，使其主動交代問題；開展階段共分為四步：大會動員；小組會上交代問題；各級領導對所交代的問題進行審查和向當事人做結論；總結收穫，號召檢舉。組織形式為按不同類型人員分若干基層，基層下設小組，每個小組約20人左右。運動於6月份結束。

1951、1952年之後，黨對知識分子有過一段相對較為寬鬆的時期，但時間很短，之後便是反反覆覆的運動，直至文革，相關內容在史學領域有很多研究，譬如：默爾·戈德曼對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研究。<sup>20</sup>

## 從知識分子改造到學校改造

思想改造是中央發起的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主要以制度生活的方式展開。在制度生活中，知識分子個體的內心是否也有要「快快改造」的緊迫感呢？對於改造，他們是甚麼樣的心態與心情呢？無法揣測，唯有呈現。

多年來，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運動，受到了多次社會主義勝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積月累的學習，知識分子原本已起了變化。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sup>21</sup>〔按：註釋為本文作者後加〕，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像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着，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

……這些老知識分子當他們搞清楚社會主義是什麼時候，他們是傾心嚮往的。但是未免發覺得遲了一步，似乎前進的隊伍裏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

去年下半年……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於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裏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一年來，情況是有些好轉，在一定場合下，有些人肯吐露些知心話了，但是還是相當靦腆的。……究竟顧慮些什麼呢？……說穿了這裏還有一個“面子問題”，……面子是很現實的東西，戴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會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為這是“德”，評薪評級，進修出國，甚至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費孝通，1957）

這是原北大教授費孝通先生 1957 年 3 月 24 日發表於《人民日報》上一篇短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部分內容，文章談知識分子，其實主要是談他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學校裏教書的老朋友過去些年心情的變化起落。字裏行間，可以看到的是在思想改造中知識分子那種對落後的緊張、對被排斥的擔憂與落寂，以及由此而來對於名分的在乎（周恩來報告中的一句「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不知振奮了多少知識分子的心）。在一個對新與舊、進步與落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着明顯界限區分的政權中，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政治標籤，這個標籤不僅關乎立場，更關乎聲名、地位及生活。在強大的制度體系中，個體的力量顯得微不足道，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分子多持積極配合的姿態，如北大在忠誠老實運動中：

自〔1952 年〕5 月 30 日全校動員，到 6 月 8 日，全校參加學習的人數為 3387 人（一部分華僑未參加），交代一般性問題的 758 人，交代反動社會關係的 1239 人，交代一般性政治問題的 940 人，交代重大政治問題的 91 人，共計 3028 人交代了各類問題，佔參加學習總人數的 89.4%。……此外，還交出槍支 3 件，軍刀 3 把。（王學珍等，1998，頁 450-451）

國家政權，通過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滲透到每個人的具體生活，把知識分子納入到既定的政治思想框架中；大學中最核心的力量——教師——也期待獲政權體系接納，得到名份。

對知識分子思想的成功規訓，使國家權力順利介入大學有了厚實的群眾思想基礎，所以院系調整時絕大多數教師都表示服從國家分配。馬寅初校長 1952 年 10 月 3 日在慶祝北大院系調整聯歡會上的講話時曾指出，「我們院系調整工作，是在我們學校經過“三反”運動後教師思想改造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回想一年以前教師學習運動開始的時候，周總理給教師們作報告，號召我們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一年以來，我們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們全校師生員工都能顧及國家的需要，

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唯其如此，這次院系調整才能取得勝利」（馬寅初，1952/1999b）。正所謂「經過思想改造來推進學校改造」。

## 院系調整，新的北京大學<sup>22</sup>

1952 年的院系調整是為配合國家建設需要，高等教育領域全面學習蘇聯模式的具體實踐。學習蘇聯甚麼呢？蘇聯模式的特點是甚麼呢？

那就是蘇聯在工業化的經驗。為了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實現西方式的工業化，那必須集中全國的國力，重點的突擊的培養一批專業人才，一定要專，否則就不能在五年內培養出來；而且舉國上下是計劃經濟，全國高度集中的計劃，什麼樣的學科需要多少人，都是政府訂的指標，……中國就學這個，短期的搞工業化，計劃經濟高度集權下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就是為了工業化培養速成的技術人才，……我們系當時也改了，叫專門化。老師學生都要求專門化，要建立教研室；教研室在西方沒有，是蘇俄來的，對應俄文的一個詞……分得很細，專門。學生也都只跟老師學很專門的東西。（研究者對 N 教授的研究訪談整理）

研究者於 2006 年在北大與 N 教授訪談時，提及院系調整，他寥寥數語，卻點明了調整的方向與特徵：專門化。

N 教授 1978 年考入北大，畢業留校任教至今。N 教授在把握歷史事件與問題上，表現出很強的脈絡意識和寬闊的學術視野，他的觀察無疑是正確的。教育部在〈關於全國高等學校 1952 年的調整設置方案〉中開篇已表明：「為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整頓與加強綜合大學，發展專門學院，首先是工業學院，自 1951 年起，全國高等學校根據國家建設的整個計劃和各地區的具體情況，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始進行全面或重點調整」（教育部，1952）。

北大在全國院系調整之前，其實已經有過一些局部的調整，如 1949 年 6 月，取消教育系，建築系停止招生（王學珍等，1998，頁 406）；同年 9 月，北大農學院與清華大學農學院、華北大學農學院合併組成農業大學（王學珍等，1998，頁 409）；12 月，醫學院劃歸衛生部，後改為北京醫學院。在 1952 年全國整體性的院系調整中，北大工學院各學習併入清華大學及其他院校；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文、史、哲、經濟等學科和理學院以及輔仁大學的文學、西語、經濟系科及南京、武漢、中山大學的哲學系併入北大。北大與其他幾所大學的政治、法律學系及其社會民政等專業則調出組建成北京政法學院。

調整之後，北大成為設有文、理、外語科三大學科的國家重點綜合大學，並於 1952 年 9 月，將校址遷至北京西郊的原私立燕京大學所在地，而私立燕京大學從此不復存在（杜勤、睢行嚴，2000，頁 12-13）。「新的北京大學」誕生了。



## 身分：走向「人民的大學」？

如前文所言，建國後中國大陸有很長一段時期是缺失了市民社會，北大乃至整個中國大學在大國家、大政府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存在，因此北大在新政權下所經歷的與其變革發展緊密相關的重大事件（critical events），幾乎都是在「國家－大學」這樣的關係情境（relational setting）中展開，這也是本研究有關北大敘事的內在相關性架構（relationality framework）。

1949 年之後，新政權替代舊政府進入大學，將北大接管為受新政權領導的為人民服務的大學，這是國家在新時期對北大發展的規定和敘事。為此，新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一是政權直接進駐大學接管校務；二是任命校長；三是對校內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四是按照國家政權利益進行院系調整。在國家對北大的敘事和相應措施中，北大均給予了積極回應。

從上文的敘事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對新政權來到北大明確表示擁護和歡迎。正因此，緊接其後在對待中央委任校長這一事件上，一方面是學校師生熱情接納新校長，另一方面是校長自覺將自身身分定位為中央政府領導管理大學的派出代理角色，所以在就職講話時便表示上有中央政府、教育部可以隨時請示，校長只有工作任務，沒有工作方針。對於大學，統一領導除了委派得力可信的校長來管理學校之外，同樣重要的任務便是與其他部門一樣，要造就具有堅實共同思想基礎的群眾。基於當時對知識分子的估計，國家決定在包括大學在內的全國範圍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因此，北大在接管和學校領導到位之後亦開始緊張的思想改造運動。在校長的組織領導下，師生積極改造，運動取得良好效果，知識分子思想被成功規訓。思想改造運動為國家權力更全面而深入地進入大學奠定了厚實的群眾基礎，所以隨後的院系調整得以在很少阻力下順利推行。

經由以上的敘事可以看到，北大師生在接管、領導與改造中，已被納入到既有的政治、思想框架中；而院系調整的成功實踐，使得北大被切實改造成了按照國家政治經濟建設需要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的重要場所。北大在黨的領導下，服從並服務於國家需要，它服膺於國家意識形態，並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框架下給學生提供專業化的學科教育，為學生將來「專業對口」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有用的「螺絲釘」做準備。如前文所指出，在高度政治化的國家和敵我二分的意識形態邏輯中，沒有具體的個人，只有國家或「人民」，其中「人民」是一個抽象的「總體」，同時更是區分敵我的政治立場標籤，為人民服務的對象不在具體的個人，而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同樣為人民服務的教育、為人民服務的大學也意指為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服務，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中則具體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至此可見，在「國家－大學」的關係架構下，顯然，北大已被建構為人民陣營的

一部分並進入了國家領域的範疇，成為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重要工具，由此其身分亦從原來的舊式大學轉為走向「人民的大學」。<sup>23</sup>

1953年9月10日第一次全國綜合大學會議召開。會議指出，高等教育在國家總路線裏是為國家培養合格幹部的重要一環，它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為基礎，適應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在廣博的基礎知識上進行專業教育，為國家培養足夠數量而又合乎規格的建設人材。其中，專科性高等學校主要在於培養技術型專門人才，而綜合大學的任務則是培養理論或基礎科學方面研究型或教學型專門人材，為經濟和文化部門輸送研究和教學的幹部（〈江副校長〉，1953）。

這看似對綜合大學方針與任務的規定，何嘗不是對建國以來高等教育、高等學校改革的總結！更具體而言，又何嘗不是對北京大學歷經改革之後身分現實的抽象描述！

## 註釋

1. 本文此處的「社會」即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市民社會一詞涵義繁雜，按照愛德華·希爾斯（2005）的觀點，「市民社會指的是社會中的一個部分，這部分社會具有自身的生命，與國家有明顯區別，且大都具有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市民社會存在於家庭、家族與地域的界域之外，但並未達致國家」（頁33）。在黑格爾的論述中，市民社會的主要組成是市場（轉引自愛德華·希爾斯，2005）。而在1949年中國新政權建立的歷史脈絡下，市民社會中的公共領域及市場均經歷中日戰爭及內戰的破壞，再加上新政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市場的排斥，以至「市場」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基本處於缺失狀態，因此可以認為 Czarniawska（1997）所說的組織的「現代身分」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社會一度簡化為「組織與國家互動的結果」，而非「組織—國家—市場」互動的結果，就此，本文所討論的這一時期新政權下的中國大學身分亦主要從大學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來考察。
2. 具體可參考肖海濤（2001）的《大學的理念》、張俊宗（2004）的《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時代回應》、劉寶存（2004）的《大學理念的傳統與變革》、韓延明（2003）的《大學理念論綱》。
3. 這亦是史學者 White 在討論歷史敘事與編年體或大事記之間的重要區別之一。White（1987）指出，編年體或大事記在時間的序列中，每一個記述末尾年分表的延續暗示着無窮事件的延續，任何編年體或大事記的歷史記載最後只是時間、事件的中斷（termination），沒有結尾（conclusion）；而敘事則不同，在一個中心主題下敘事最後將產生一個有寓意的結論或結尾（p. 17）。
4. 「意識形態」一詞在中文語境中受到廣泛使用，但卻很難給出確切含義。克利福德·格爾茨（1999）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對它的解釋比較符合本文對該詞的使用本意。格爾茨指出，「意識形態」原本是指一套政治建議的概念，也許有點迂腐和不切實際，但卻不失浪漫想像（頁231）；但在現代知識史上這個詞本身卻被意識形態化了，

按照《韋伯斯特辭典》，它指的是一整套構成政治—社會綱領的判斷、理論及目標，經常伴隨着人爲宣傳的含義。

5. 按照毛澤東（1957）的說法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疇，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頁 1-2）。
6.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總是不厭其煩地引用政策文本的「他」說，而不是「我」說來展開論述，這主要是源於本研究所採取的「文本詮釋」（textual hermeneutics）的基本旨趣。在研究中，「我」旨在嘗試理解「他（們）」是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建構起某一概念（如「人民」、「人民的大學」）的意涵或意象，並將其呈現出來。任何歷史都是「立場史」——即基於某種立場之上的言說。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是政治角力場的倫理；而在本研究中，有立場之分但無是非之別，所以文中更多見的是「他（們）」說，而非研究者的判斷。
7. 對「人民教育」的解釋，很大程度受劉雲杉（2001）對「人民教師」解釋的啓發。她認爲「人民教師」中的「人民」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對象性質的，指爲人民服務的教師；其二是屬概念性的「人民」，意指屬於人民陣營的教師（頁 55）。
8. 「舊式大學」，在研究者所查閱的文獻中並沒有看到詳細的專門解釋或論述，但從不同文本的零散表述及對此概念使用的語境來看，「舊式大學」（或者舊式高等學校）與「舊教育」的概念有共通的含義，主要是基於新政權的政治立場對國民黨政府所領導的大學的泛稱。
9. 「又紅又專」是毛澤東所寫《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一條，說的是政治與業務之間的關係，即：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工作中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毛澤東，1958/1986）。
10. 其實在新政權正式成立之前，黨就一直非常重視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並在 1949 年 9 月 29 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將其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即當中第四十七條，「有計劃有步驟地……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
11. 《武訓傳》講述的是 19 世紀一位教育家如何從沿街乞討，最終成爲地主，把錢用於開辦學校的過程。黨把武訓視作反面人物的典型，主要在於他企圖通過教育和改良而非通過革命來改造中國（默爾·戈德曼，1990）。
12. 在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1998）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頁 403）中亦有類似紀錄，但遺憾的是，研究者沒有找到當時的一手描述。
13. 胡適校長走的前一天，他給湯用彤、鄭天挺教授留下便條：「今日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遵照囑託，1948 年 12 月 16 日，大學行政第 74 次會議推舉湯用彤、周炳琳、鄭天挺三先生爲行政會議常務委員，負責校務（王學珍等，1998，頁 393）。

14. 鑑於大學校務委員會的成立，隨後於 1949 年 5 月 9 日，文管會派駐北大的代表和聯絡員撤出。
15. 草案在 1950 年 7 月 28 日政務院第 43 次會議正式通過。
16. 1957 年，中國經過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宣布實現公有制，進入社會主義時期。
17. 學習文件包括：〈什麼是愛國主義，為什麼要愛祖國〉、〈論國民公德〉、〈榮譽是屬於誰的〉、〈對事務工作的認識〉等（見王學珍等，1998，頁 437–438）。
18. 1951 年開始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向知識分子灌輸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北大的自由散漫必然是改造的首要目標。
19. 中央教育部爲了組織北京、天津其他各高等學校師生參加學習，同時又爲了避免首長輪流到各大學做報告的困難，決定擴大這次學習的對象範圍（馬寅初，1951/1999a），所以報告會是以北大爲主，亦包括北京、天津其他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代表。
20. 見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1990）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五章「黨與知識分子」。
21. 即周恩來 1956 年 1 月 30 日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報告中肯定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爲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爲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見《人民日報》，1956 年 1 月 31 日）。
22. 「新的北京大學」，這一說法來自馬寅初校長 1952 年 10 月 3 日在慶祝北大院系調整聯歡會上的講話。
23. 「人民的大學」是個極具政治意涵的概念，由於其中所蘊含的行政治理模式，因此，有學者也用「官僚化」（在研究者於 2006 年對北京大學 W 教授的訪談中，W 教授就提到 20 世紀 60 年代非教學人員的迅速膨脹，主要原因在於「國家沒有一個民主的體制，官僚的權太大，官員要經營，使得他的政令上傳下達，下行上達，政令通暢，要維護這條系統，就把學校迅速官僚化」）一詞來概括這歷史時期大學的身分特徵。確實，這一時期的中國大學並非遠居社會國家（即遠離社會功利、國家政治）之外的純粹問學之地（其實中國現代大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但是否就可簡單地以「官僚化」來概論呢？其實，在意識形態的規制之下，仍然可以看到堅持學術與獨立思考的暗流。在北大，最好的例證便是馬寅初校長本人。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馬寅初校長因發表〈新人口論〉多遭批判，但面對口誅筆伐，他奮力抗爭，堅持學術主張，並力主從政治問題中區分出來。與馬老在校長就職典禮的演說相比較，前後似乎多有矛盾之處。但在研究者看來，其實不然，這內裏實際上恰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的處境與良心選擇。就像研究中所提及的，在建國前後，很多知識分子因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轉而支持共產黨政府。建國初期政府的施政方針應該說多是符合國情的，很多知識分子也對之寄予厚望並願意相信和服從政府的領導，爲政府貢獻。在這點上，馬老的就職演說有明顯體現。

然而，學術在於求真，講求「知識上的誠實」（馬克斯·韋伯，1998，頁 37）；政治在於求勝，是權力者的遊戲，利益先導，變幻多端。學術與政治，兩者本就不在同一條線上，怎麼能恆常不變地集中統一於一個人身上？有論者在提及胡適先生的時候有一句話「名人本性是書生」（李振東，2003，頁 159），這一評論也同樣適用於馬老。如果承認 1957 年的「反右」運動是中國政治逸出正常軌道的一次偏離，那就

可以很好地理解馬老前後看似矛盾行為中背後的一致性。變化的政治現實與馬老不變的政治期待及學術堅持放在一起，衝突產生了。這種時有出現的衝突，在研究者看來就像一股暗流，而正是這股暗流的存在，由西方在中世紀大學產生以來大學之為大學的傳統與特性在中國的大學中才算沒有完全喪失；亦正是這股暗流的存在，才使得中國的大學在那個極度意識形態化的特殊時代仍然微光隱現；同樣也正是這股暗流的存在，北大的傳統才不至在那段時期中斷而得以延續下來，在改革開放後，重新承擔起它的社會責任。

## 參考文獻

- 中共中央（1998）。〈中共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  
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 132–133）。  
海口，海南：海南出版社。〔原著於 1951 年發表〕
- 毛澤東（1949）。《論人民民主專政》。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57）。《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86）。〈又紅又專〉。載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頁 803–805）。  
北京：人民出版社。〔原著於 1958 年發表〕
-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1998）。《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  
（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任劍濤（1998）。〈大學的主義與主義的大學：北大百年與現代中國大學精神的顛變〉。  
《東方文化》，第 5 期。2010 年 3 月 22 日擷取自網頁：<http://www.tcyllaw.com/yld/web/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1>
- 〈江副校長在全體教師大會上傳達綜合大學會議精神〉（1953，10 月 16 日）。《北京大學校刊》，第 2 期，第 2 版。
- 克利福德·吉爾茲（著），王海龍等（譯）（2004）。《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  
（第 2 版）。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1999）。《文化的解釋》。南京，江蘇：譯林出版社。
- 呂林（編著）（1989）。《北京大學》。長沙，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李振東（2003）。《北大的校長們》。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杜勤、睢行嚴（2000）。《北京大學學制沿革：1949–199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肖海濤（2001）。《大學的理念》。武昌，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 周恩來（1998）。〈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 119–122）。海口，海南：海南出版社。〔原著於 1951 年發表〕
- 馬克斯·韋伯（著），馮克利（譯）（1998）。《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北京：三聯書店。
- 馬寅初（1951，6 月 15 日）。〈馬校長在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北大校刊》，第 5 期，第 1 版。

- 馬寅初(1999a)。〈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活動〉。載馬寅初，《馬寅初全集：第十四卷》(頁210–213)。杭州，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原著於1951年發表〕
- 馬寅初(1999b)。〈在慶祝北京大學院系調整聯歡會上的講話〉。載馬寅初，《馬寅初全集：第十四卷》(頁243–245)。杭州，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原著於1952年發表〕
- 馬寅初(1999c)。〈職員暑假學習〉。載馬寅初，《馬寅初全集：第十四卷》(頁196–201)。杭州，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原著於1951年發表〕
- 〈馬寅初校長到校就職〉(1951, 6月15日)。《北大校刊》，第5期，第1版。
- 馬紱倫(1951, 6月15日)。〈馬紱倫部長代表教育部致辭〉。《北大校刊》，第5期，第1版。
- 馬紱倫(1998a)。〈馬紱倫部長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開幕詞〉。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25–27)。海口，海南：海南出版社。〔原著於1950年發表〕
- 馬紱倫(1998b)。〈馬紱倫部長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開幕詞〉。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6–7)。海口，海南：海南出版社。〔原著於1949年發表〕
- 張俊宗(2004)。《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時代回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教育部(1952)。《關於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案》。北京：教育部。
-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2005)。《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曾昭掄(1950, 2月1日)。〈解放後北大業務課程概括〉。《北大週刊》，第22/23期，第3版。
- 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王建朗等(譯)(1990)。《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費孝通(1957, 3月24日)。〈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人民日報》。2010年3月22日擷取自網頁：<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feixiaotong/2007-04-07/1273.html>
- 愛德華·希爾斯(著)，李強(譯)(2005)。〈市民社會的美德〉。載鄧正來、J. C. 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頁32–50)。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楊振聲(1950, 3月10日)。〈週刊要作些什麼？〉。《北大週刊》，第26/27期，第4版。
- 劉小楓(1998)。〈丹東與妓女〉。載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現代倫理的敘事緯語》(頁1–2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劉雲杉(2001)。《教師與中國現代國家的關係研究》(未發表之博士後論文)。北京師範大學，北京。
- 劉寶存(2004)。《大學理念的傳統與變革》。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蕭超然等（編著）（1988）。《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第 1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錢俊瑞（1998）。〈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載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頁 17–25）。海口，海南：海南出版社。〔原著於 1950 年發表〕
- 默爾·戈德曼（1990）。〈黨與知識分子〉。載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 231–27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韓延明（2003）。《大學理念論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羅常培（1951，6 月 15 日）。〈歡迎馬寅初先生長北大並分析北大的現狀〉。《北大校刊》，第 5 期，第 3 版。
- Calhoun, C. (1994). Preface. In C.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1–7). Oxford, Engl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Czarniawska, B. (1997). *Narrating the organization: Dramas of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alambos, M., & Holborn, M. (Eds.). (2000). *Sociology: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5th ed.). London, England: Collins Educational.
-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2000). Formulating a social self. In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The self 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pp. 17–37).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oeur, P. (1991a).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In 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pp. 20–33).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icoeur, P. (1991b). Narrative identity. In 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pp. 188–199).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omers, M. R. (1997).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lass formation theory: Narrativity, relational analysis, and social theory. In J. R. Hall (Ed.), *Reworking class* (pp. 73–10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omers, M. R., & Gibson, G. D.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C.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37–99). Oxford, Engl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White, H. (1987).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H.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 1–25).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Under the New Regime Since 1949: A Narrative Study on Peking University**

Yun LUO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er of state power since 1949,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 and their influences are still there.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these universities during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is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oday's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s well as the recent reforms they have undergone. This study adopt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method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changes and new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since the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unded the new nation, with Peking University as a case in poi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due to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adopted by the new state power and the absence of market forces, the identity of universiti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hina was constructed amid the interactive forces of state and university. Since 1949, after takeover, restructuring and other measures by the state, universiti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existing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s and joined the mainstream socialist camp. Since then,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became tools to serve the country, serve the people, and serve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ccordingly, their identity changed from old-fashioned universities to "people's universities" laden with heavy political meanings.*

*Keywords: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dentity; Peking University; narrative*